



崔克海默文集 第一卷

马克斯·霍克海默 西奥多·阿道尔诺 著

启蒙辩证法 哲学断片

渠敬东 曹卫东 译



Max Horkheimer

马克斯·霍克海默 西奥多·阿道尔诺 著

启蒙辩证法
哲学断片

霍 克 海 默 文 集 第 一 卷

曹卫东 编

渠敬东 曹卫东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德)霍克海默,(德)

阿道尔诺著；渠敬东,曹卫东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霍克海默文集;1)

ISBN 7-208-03667-5

I . 启... II . ①霍... ②阿... ③渠... ④曹...

III . 法兰克福学派-哲学思想 IV . 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0792 号

Max Horkheimer/Theodor W. Adorno-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taken from: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5,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und Schriften 1940 - 1950

Copyright entry: Copyright 1944 by Social Studies Association, Inc., New York.

Für die Neupublikation: © S. Fischer Verla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969.

责任编辑 忻雁翔

封面装帧 王晓阳

霍克海默文集 第一卷

启蒙辩证法

——哲学断片

马克斯·霍克海默 西奥多·阿道尔诺 著

渠敬东 曹卫东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5 号 www.ewen.cc)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5 插页 6 字数 252,000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208-03667-5/C·104

定价 22.00 元



马克斯·霍克海默

编者说明

在西方当代社会思想史上,霍克海默是一个比较特殊,也比较复杂的人物:他从不追求个人思想体系的建构,而关注于社会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从不追求个人思想成就的宏大,而倾心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命题的规划和奠基。因此,在纪念霍克海默诞辰 90 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哈贝马斯对他的老师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在法兰克福学派圈子里,霍克海默享有一种特殊的地位。他不仅长期担任社会研究所的所长,而且还具体负责编辑《社会研究杂志》;他也被公认是许多集体研究计划的精神领袖。然而,除了这样一个核心角色之外,霍克海默还有另外一面鲜为人知:即霍克海默自己的哲学著作和他的众多同伴的哲学著作一样,都是他们这个流亡知识分子集体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霍克海默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坚定不移地捍卫‘法兰克福学派’这样一个集体单称 (*Kollektivsingular*)。”(J. Habermas, Max Horkheimer: “Zu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seines Werkes”, 载其: *Texte und Kontexte*, Suhrkamp, 1992)

哈贝马斯这番话的意思其实比较明确,就是想着重强调霍克海默与法兰克福学派之间所存在着的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今天看来,可以说,没有霍克海默,也就没有批判理论;没有霍克海默,德国当代社会思想恐怕也要逊色许多。

我们这样说，固然包括霍克海默自身的思想力度，但更多地还是指霍克海默在法兰克福学派发展过程中，乃至在德国当代思想界所扮演的卡里斯玛角色。因此，要想深入理解批判理论，进而把握住当代德国社会思想格局的变化，则搞清楚霍克海默的思想路线，以及他在德国现代社会思想史上的地位，无疑是不可逾越的一环。这就难怪霍耐特(Axel Honneth)后来在系统清理批判理论历史效果时，把霍克海默当作首要的批判对象，由此来深入考察批判理论在规范基础和经验分析方面的成败得失，以及批判理论与现实世界之间已经存在和可能存在的互动关系。

汉语学界移译和研究霍克海默著作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为了较为全面地介绍霍克海默的思想，进一步推动汉语学界对霍克海默的理解和接受，我们决定翻译出版多卷本的“霍克海默文集”。

“霍克海默文集”在编选和翻译过程中得到了许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德国菲舍尔出版社(S.Fischer Verlag)国际部的波德莱齐女士(Frau Gisela Podlech)在版权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两任所长福利德堡教授(Prof. Dr. L. v. Friedeburg)和霍耐特教授给编者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学术环境；法兰克福大学图书馆的“霍克海默档案馆”(Horkheimer - Archiv)向我们提供了霍克海默的一些珍贵手稿以及相关的背景资料，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献给弗里德里希·波洛克^{*}

* 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是霍克海默的好友,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学术成就虽然不算高,但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贡献却非同寻常,对霍克海默的影响更是深远,可以说,没有他的鼎力支持,霍克海默很难顺利领导法兰克福学派。1944年版题为:“献给波洛克:五十岁寿辰(1944年5月22日)”,1947年版题为:“献给波洛克:五十岁寿辰”。——中译注

新版前言

(1969)

1947年,《启蒙辩证法》在阿姆斯特丹的奎里多(Querido in Amsterdam)出版发行。这本书渐渐地流传开来,很久以前就已经销售一空。二十多年后,我们再重新发表该书,促使我们这样做的不仅有各种各样的动力,主要还是我们认为,书中的不少思想今天尚未过时,而且对于我们后来的理论思考还有着进一步的影响。局外人很难想象,我们两个人在每一句话上是如何的紧密协作。大的段落安排是我们共同商量决定的;我们两个人的精神气质虽然有所差别,但在《启蒙辩证法》中却融为一体了,并且成为了一种共同的生命因素。

并不是书中的所有内容,我们现在都坚持不变。这样做是不合理论要求的,因为一种理论是要寻找时代的真谛,而不是把自己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与历史进程对立起来。这本书是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恐怖统治行将就寝的时候撰写出来的。书中的许多说法已经与今天的现实不相适应。但是,我们当时对向宰制世界(verwaltete Welt)的过渡并没有作出过于乐观的评价。

今天,政治上分裂成为两大对立阵营,这就在客观上迫使相互大动肝火,因此,恐怖还继续存在。第三世界中的冲突,以及极权主义的重新抬头等等,这同当年的法西斯主义一样,可不是

单纯的历史插曲,《启蒙辩证法》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连进步也不放过的批判思想,今天要求支持所剩不多的自由,捍卫现实中的人道倾向,而不管它们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

本书所揭示的集权统一化趋势虽然中断了,但并没有彻底终结;在专制和战争当中,它的威胁还无处不在。本书曾经诊断认为,启蒙转变成了实证论,转变成了事实的神话,转变成了知性与敌对精神的一致,所有这些诊断今天都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的历史概念并没有误以为它们已经得到了克服,而且也没有从实证主义的角度去追求一知半解。作为对哲学的批判,它并不打算放弃哲学。

这本书写于美国;我们之所以要从美国返回德国,是因为我们确信,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我们在德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会更有作为。我们和波洛克一道重建了社会研究所(*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当年他50寿辰的时候,我们曾经用本书献上祝贺;今天,适逢他75华诞,我们再次献上新版用以志贺。我们重建社会研究所,是想把《启蒙辩证法》所表达的观念继续推向深入。和我们撰写第一版的时候一样,格蕾特·阿道尔诺(Gretel Adorno)给予了我们最好的帮助,使我们的理论能够有所发展,并培育起相关的共同经验。

一般情况下,时隔几十年之后,新版图书都会有很大的修改,而我们对于修订则是慎之又慎,能不改,则坚决不改。我们不想对过去写下来的文字作太多的修饰,甚至一些显然不合时宜的地方也未作改动;根据现实情况来重新修订著作予以发表,无异于撰写了一部新的著作。今天,更重要的事情是捍卫自由,传播自由,实现自由,而不是间接地促使世界走向专制,这点我

们在后来的著作中也明确提了出来。我们主要是订正了一些印刷错误，而且仅此而已。我们这样谨慎，是想让本书成为一部历史文献，当然，我们同时也希望，本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文献，而且是能够更有贡献一些。

霍克海默 阿道尔诺

1969年4月于美茵河畔法兰克福

意大利版前言*

(1962/1966)

德文版《启蒙辩证法》是一部断片。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准确地说是在1942年,我们就已经开始着手撰写这本书。当时还处于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之下,按照我们原初的设想,它应当成为一部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的导论。结合所使用的名词以及所探讨的问题范围,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本书深深地打上了我们写作时所处社会环境的烙印。

这本书所探讨的是这样一个主题,即文化进步走向其对立面的各种趋势。我们想根据20世纪30和40年代美国的社会现象来揭示这一主题。但是,理论的系统阐述如果想适应当代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需要,就必然会提出更高的要求,而这一点是我们今天所无法胜任的,这有客观原因,当然也有主观原因。因此,我们觉得十分欣慰,这本断片今天能被收入一套主要关注哲学问题的丛书当中。

霍克海默 阿道尔诺

1966年3月于美茵河畔法兰克福

* 这篇前言是由菲利普·里普尔(Philipp Rippel)根据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提供的德文草稿,从意大利文翻译过来的。——中译注

前　　言

(1944/1947)

本书最初是打算献给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的，我们开始的时候，计划在他50岁生日之际完成本书的写作任务。可是，我们越是深入下去，就越是深切地感到，我们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我们本来的计划，实际上是要揭示人类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状态，反而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其原因究竟何在。我们低估了探讨这一问题的难度，因为我们过于信赖当代的意识。许多年以来，尽管我们早就认识到，现代科学的研究中的许多重大发现都是靠牺牲理论结构换来的，但我们始终认为，现代科学的研究还是值得坚持的。因此，我们的研究仅限于批判和继承专业学说，起码在主题上还拘泥于传统学科，比如社会学、心理学和认识论等。

但我们在组织起来的断片充分表明，我们必须放弃对当代意识的这种信任，对科学传统加以细心呵护和认真筛选。特别是当实证主义者指责科学传统如同无用的包袱而应当予以抛弃的时候，我们就更是应该对科学传统加以细心呵护和认真筛选。如果说这样做本身就构成了认识的一个环节的话，那么，在当代资产阶级文明崩溃过程中，值得追问的就不仅有科学的研究，也包括科学的意义。铁蹄法西斯主义者虚伪颂扬的，以及

狡猾的人文专家幼稚贯彻的，就是：启蒙的不断自我毁灭，迫使思想向习俗和时代精神贡献出最后一点天真。一旦公众进入了下述状态：思想难免会成为商品，而语言则成了对商品的颂扬，那么，揭示这一堕落过程的尝试在被其世界历史后果彻底毁灭之前，就必须拒绝有关的语言要求和思想要求。

如果说这些只是科学在遗忘自我和工具化过程中所带来的—些障碍的话，那么，关于社会问题的思考至少可以和官方的科学唱反调。但即使这样做，也还是处于整个生产过程当中。高唱凯歌的思想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对它们进行了反驳。思想如果存心想摆脱其批判环节而单纯服务于现存制度，那么，它就会在违背意志的情况下推动它所选择的积极因素向消极的破坏因素转化。在 18 世纪，哲学对无数拒斥耻辱的书和人视而不见，而在波拿巴 (Bonaparte) 的领导下完成了这一转化。孔德的护教学派最终强行成为和它格格不入的百科全书派的追随者，向先前所有反对它的人都伸出了友善之手。肯定过程中的不同批判形式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理论的形态，而理论的真实性却消失不见了。当前，机械化的历史远远走在了精神发展的前头，官方发言人操心的是其他的事情，他们靠着理论获得了锦绣前程，但是，在理论还没有出卖其灵魂之前，他们就把理论给消灭了。

因此，思想在思考自身罪责的时候，也认识到了，遭到剥夺的不仅有对科学概念语言和日常概念语言的肯定性使用，也有对对立的概念语言的肯定性使用。凡是和统治思想不合拍的，都再也无法表达出来了；支离破碎的语言无法独立完成的一切，社会机器一点不落地都给补上了。由于害怕电影制片厂的成本越来越昂贵而建立了审查员制度，这和一切类似的管辖制度是相吻合的。一部文学作品，撇开制造商的选择不算，至少还要经

过学术总监、主编、编辑、出版社内外的捉笔者等，这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教育系统的抱负不管如何改变，看来都是要让审查彻底失去意义。有人认为，如果不严格确定事实和可能性，认知精神就会对骗术和迷信过于敏感。这种观点让人们对骗术和迷信难以产生接受的冲动。禁酒会导致更加有毒的物品横行，同样，理论想象力一旦受阻，则会导致政治幻想猖獗。只要人们还没有沉湎于政治幻想之中，外在的和内在的检查机器就会剥夺掉他们的反抗手段。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疑难是我们必须探讨的第一个对象：启蒙的自我毁灭。我们并不怀疑，社会中的自由与启蒙思想是密不可分的。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同样也清楚地认识到，启蒙思想的概念本身已经包含着今天随处可见的倒退的萌芽。在这方面，启蒙思想与相关的历史形态和社会制度比较起来并不逊色。如果启蒙没有对这一倒退的环节进行反思，它也就无法改变自身的命运了。由于对进步的毁灭力量的思考一直都掌握在它的敌人手里，因此，实用化的思想失去了其扬弃的特征，进而也失去了与真理之间的联系。技术造就起来的大众时刻准备着投身到任意一种暴政当中；他们天生就亲近种族的偏执狂，尽管这样做十分危险，也毫无意义；但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代理论观念的弱点究竟何在。

我们认为，这些断片的贡献在于，它们阐明了，启蒙倒退成神话，其原因不能到本身已经成为目的的民族主义神话、异教主义神话以及其他现代神话中去寻找，而只能到畏惧真理的启蒙自身中去寻找。我们必须从思想史和现实的角度去理解启蒙和神话这两个概念。同启蒙一样，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运动都表现为观念，而这些观念又体现在人和制度身上；同样，真理

不仅仅是理性意识，同样也是包括理性意识的实际形态。现代文明的真正传人害怕偏离事实，一如他们害怕偏离社会。他们不知道，事实在被觉察到的时候已经受到了科学、商业以及政治中的惯例的严格规整。语言和思想中的明确性概念也受制于这些惯例，而当代的艺术、文学和哲学又都应当具备这样一种明确性概念。明确性概念认为，源于事实和统治思想形式的否定思维是模糊的、零散的，是一种禁忌，因此，它像着了魔似地把精神控制在一种越来越盲目的状态之中。有一种情况堪称无可救药，这就是：最真诚的改革家用支离破碎的语言主张革新，而连他们都接受了精致的范畴机器以及背后的糟糕哲学，从而强化了现存制度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正是他们想要打破的。错误的明确性不过是神话的另一种表达而已。神话既是模糊的，又是明确的。它从一开始就通过信任和摆脱概念的劳动来证明自己。

今天，人性的堕落与社会的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经济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为世界变得更加公正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让机器和掌握机器的社会集团对其他人群享有绝对的支配权。在经济权力部门面前，个人变得一钱不值。社会对自然的暴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一方面，个体在他使用的机器面前消失不见了，另一方面，个体又从机器那里得到了莫大的好处。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加，大众变得更加易于支配和诱导。社会下层在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时候，付出的代价是社会地位的下降，这一点明显表现为精神不断媚俗化。精神的真正功劳在于对物化的否定。一旦精神变成了文化财富，被用于消费，精神就必定会走向消亡。精确信息的泛滥，枯燥游戏的普及，在提高人的才智的同时，也使人变得更加愚蠢。

并不是像文明批判者(如赫胥黎、雅斯贝尔斯、伽塞特等)所说的那样,关键在于作为价值的文化;而是在于,如果人冥顽不化,启蒙就必须在自己身上做文章。关键并不在于维持过去,而在于让美梦成真,然而,今天,过去依旧在维持,而且是以破坏过去为代价。直到19世纪,教育一直都是一种特权,牺牲的是未受教育者的幸福。到了20世纪,工厂像铁幕一样,消解了一切文化。文化捍卫者认为,如果出卖文化没有破坏经济成就,代价或许就不会如此昂贵。

在一定的情况下,幸福的因素本身就变成了不幸的源泉。过去一段时间,国内经济出现危机,生产出现过剩,由于缺少社会主体,于是,大众挺身而出;如今,由于权力集团成为了社会主体,于是,它们便制造了世界范围内的法西斯恐怖:进步变成了退步。十分清洁的工厂以及里面的一切,大众汽车和体育场馆,使形而上学变得无聊不堪,对此,我们尚可不闻不问;但是,在整个社会里,这些东西本身变成了形而上学,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帷幕,遮蔽的是现实的无可救药,对此,我们就不能袖手旁观了。这就是我们的断片所关注的首要问题。

本书的第一篇论文是全书的理论基础,探讨的是合理性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自然与控制自然之间相应的复杂关系。其中对启蒙的批判,目的是想准备好一种实证的启蒙概念,以便把它从与盲目统治的纠结之中解脱出来。

总体来看,第一篇论文主要阐述的是这样两个主题:即神话就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了神话。两篇附论用一些具体的例子对这两个主题做了进一步的阐明。第一篇附论根据奥德修斯的故事,探讨了神话与启蒙之间的辩证法,在作者看来,奥德修斯是西方资产阶级最早的一个原型。核心概念是牺牲和放弃,

从这两个概念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神话自然与启蒙对自然的统治之间既有差异性,也有同一性。第二篇附论讨论的是康德、萨德以及尼采等一些坚定的启蒙终结者,集中阐明了自然对主体的臣服最终在对自然和客体的盲目统治中是如何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这一趋势消解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切矛盾,特别是严肃的道德与绝对的不道德之间的矛盾。

《文化工业》一文阐明的是启蒙意识形态的倒退,这一点在电影和广播表现得十分清楚。在这些传媒里,启蒙主要表现为对制作和传播的效果和技术的算计;而就其具体内涵而言,意识形态集中体现为对存在者和控制技术的权力的偶像化。在探讨这一矛盾的时候,我们会认真对待文化工业,这样做是大大出乎文化工业自身的愿望的。《文化工业》一文比其他部分更加具有断片色彩。

《反犹主义要素》一文的主题是已经启蒙的文明在现实当中又倒退到了野蛮状态。合理性不仅包含着观念中的自我毁灭趋势,也包含着实际上的自我毁灭趋势,而且从一开始就这样,而不是在自我毁灭趋势出现之后才是如此。我们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溯反犹主义在哲学上的史前史的。反犹主义的“非理性主义”来源于宰制理性自身的本质以及与理性观念相应的现实世界。《反犹主义要素》一文与“社会研究所”的经验研究有着直接的联系。“社会研究所”是魏尔(Felix Weil)出资建立的,没有魏尔的长期资助,不仅我们的研究工作无法展开,希特勒统治期间德国流亡知识分子的理论研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也将难以继。前三篇文章是和洛文塔尔(Leo Loewenthal)共同完成的,早在法兰克福期间,我们相互就共同探讨过许多理论问题。

最后一部分是笔记和札记,其中,有些是论文的提纲,有些